

『家族记忆』第2辑

《花城》杂志 主编

家族的所有往事

都将永久存留于亲人的脑海中
并在岁月的深处闪光

桃李劫

『家族记忆』第2辑

《花城》杂志 主编

大业
于劫

广东省出版集团
花城出版社
中国·广州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桃李劫 / 《花城》杂志主编. — 广州 : 花城出版社, 2012.8

(家族记忆. 第2辑)

ISBN 978-7-5360-6461-4

I. ①桃… II. ①花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162864号

出版人：詹秀敏

丛书策划：田瑛 朱燕玲

责任编辑：许泽红

技术编辑：易平

装帧设计：李咏瑶

封面供图：萧智仁

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)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台山市人民印刷厂有限公司
(广东省台山市北坑开发区)

开 本 880 毫米×1230 毫米 32 开

印 张 7 1 插页

字 数 180,000 字

版 次 2012年8月第1版 2012年8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 22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购书热线: 020—37604658 37602954

花城出版社网站: <http://www.fcpn.com.cn>

“家族记忆”是《花城》杂志2010年新推出的栏目，它隶属非虚构范畴，取材于真人真事。作品既有名家的家族往事，又有普通人的亲情故事。作者也不再附身于文字中，而是直接成为作品中的主角之一，揭开尘封的记忆，反映远去时代的社会现实，挑起同辈人的集体记忆，引起读者的共鸣。

《花城》杂志由此主编“家族记忆”丛书，将一年六期的六篇作品结集精编出版。自第一辑《远去的面孔和背影》之后，今年推出第二辑——《桃李劫》。

开篇的《桃李劫》，相差四十余年的忘年恋，没有缠绵悱恻的爱情，有的是一个文学女青年对丈夫亦师亦友的崇拜与疼惜，看她将这段婚姻经历娓娓道来，让人怜惜、沉痛。散文诗《母亲的牙齿》用最真实的语句展示一位伟大而平凡的母亲；《母亲本纪》着力还原一个弱小而又坚毅的母亲，平和的语言中饱含深情；还有《父亲没有故事》《菜园母亲瓜棚事》《离离草》。六篇

散文结集的是六个身份地位、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作者的故事。

人生总脱不开情感的羁绊，我们纠结其中而又甘之如饴。他们已远去，无知无觉，生者仍然要挣扎奋斗于当下，承受活着的悲欢离合。六个故事再现他们的人生，生命在亲人的笔下再一次绽放。作者的生命感悟不尽相同，但都返璞归真，不刻意雕琢、修饰，着力展现平凡生命的人生价值。六个故事，或平和冲淡，或激情澎湃，始终贯穿在文字中的是厚重而疼痛的失去与获得。

生命和记忆不会随着肉身的消失而了无痕迹，家族的往事，都将存留在亲人的脑海中，并在岁月的深处闪光，成为他们曾经存在于这个世界印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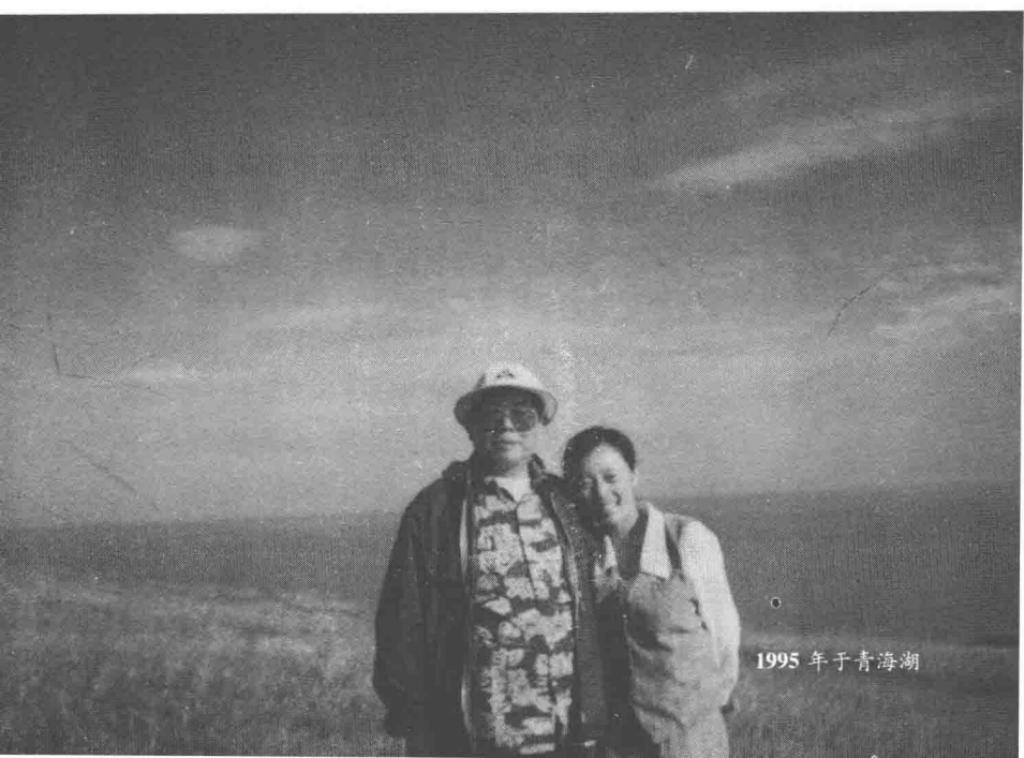
《花城》杂志

目录

桃李劫	何庆华	＼
母亲的牙齿	张尔容	＼
母亲本纪	耿翔	＼
父亲没有故事	梁绍武	＼
菜园母亲瓜棚事	俞天白	＼
	彭建平	＼
离离草	185	155
	125	99
	71	1

桃李劫

何庆华



1995 年于青海湖

那是神在春天发出的一个咒语。

我义无反顾奔赴这个“劫难”，因为
那是我的“延安”。

这一切就像一个传说……

2000年7月6日。

一个寻常的日子，在合肥中市区民政局，我和他摁下了神圣的手印。没有鲜花，没有掌声，甚至没有一声祝福，他71岁，我29岁，我们的年龄加起来刚好100岁！

他说：嫁给我就是嫁给了文学。

那年初相识

1993年，春天，合肥。

那时我还是合肥某医院实习的学生，一个怀揣着文学梦的江南小姑娘。为什么会选择合肥学医，理由只有一个，因为那里是《诗歌报》的故乡，在我的梦中那儿的空气里全是诗。

诗在召唤着我！

那是5月的一天，我跟着门诊时结识的一位美术老师，去拜会一位叫白榕的作家。天正下着淅淅沥沥的春雨，我穿着一双高筒胶鞋去见他。他个儿不高，有些胖，头发花白，穿着领口打着补丁的白衬衫，敦厚地端坐在一把发亮的老藤椅里。他时常像骆驼一样眯缝着眼睛，他的牙齿稀少，说话的声音不紧不慢，抑扬顿挫还带有点磁性。客厅是幽暗的，点了一盏小台灯，墙壁是斑驳的，整个屋子充满了一种昏黄的宁静安详，似乎这不在闹市，一听他说话，外面的世界就完完全全地消失一次。

“我读了你的诗了，那是诗！要知道，有的人写了一辈子文章结果证明是一个误会，而你是属于文学的！我原本不再收弟子了，难得你有这灵气天分，希望你不是

只在文学的边上转转的，要跟我学就要和文学走一辈子！”我支吾着不敢吭声，一旁的美术老师急了，说：“名师就在眼前还不快喊老师！”他哈哈一笑说：“好，我就收下你这个‘小不点’了！”

我完全没有想到他会与我的生命有关。在此之前，我并不知道白榕是谁，也未曾读过他的文章。在我懵懂地离开这个大院时，才看清门边挂着一块白漆斑驳的木牌，上书“安徽省文联，宿州路9号”。

啊，这是《诗歌报》的诞生地。

于是剃了一个男孩头的我，怀着别样的心情，会在每个礼拜来宿州路9号一次，交一篇习作，顺便给白老师捎带一些吃食，帮他读报抄稿寄信。

在这个简陋的家里，我总觉得缺了些什么，但我不便问，因为对于合肥来说，我不过是个匆匆过客，我将很快回到我的故乡太仓当一名医生，而对于这位没有一点作家架子的老先生，我只是有一种难以言说的亲切感。文学几乎成了我的宗教，而他实在是个不修边幅的布道者。他似乎只为他的文字而活着，时不时地爆发出与他的年龄很不相称的笑声。

他似乎没有过去，只有现在和将来。

一天下午，满头大汗的我给他送去两个西瓜，他忙要我切两片一块儿吃：“我就要看我的小不点吃西瓜。我的眼睛动过刀，可刚才还是清清楚楚地瞧见你小鼻尖上的汗珠了，可爱，一笑还三个酒窝！”“我才不在白老师面前啃西瓜呢，张牙舞爪的！”“好，那我就不看你吃！”说完他居然真背过脸去，逗得我咯咯直笑。“小不点为啥要剪个男孩头呀，留长发多好看，我喜欢鬓发如云。”“您不晓得剪头发是一种小小的自杀吗？”“哦，那我倒要在这个夏天死死看！”他坐在藤椅里，笑得胖乎乎的肚皮一抽一抽的，脸上居然不见一丝皱纹，实在像一只憨态可掬的大白猫。他

又慢慢踱进卧室抱出一沓稿子来：“我马上要出一本散文诗集了，叫《云诉》，好听吗？你的笔名里恰好也有个云哟！你这片云能不能不飘走，就在合肥生根？我愿意你在我肩头开花！”

我的笔名叫冰云，他的《云诉》让我心跳，我笑着摇摇头。

他轻叹了一声，说：“你走了，我会老的！”

我以为他在和我开玩笑，在我面前他时常像个顽童。他寄到医院的信更逗得全科室的大夫哈哈大笑，那字体大小不一，参差不齐，伸胳膊摆腿，互相串门，了无拘束，我戏称它为娃娃体。我和他的交往从一开始就没分长幼尊卑，也就没有任何隔阂障碍。

在我即将返回故乡工作的前两天，我带着刚从家乡寄来的肉松匆忙向他作别。

“我打电话到处找你也找不到，你到哪儿去了！瞧我满纸都写着：小不点要走了！小不点要走了！不走行吗！”他显然有些激动，一见面就边跺脚边冲我嚷嚷。

“我不要吃什么肉松，我只要你做我女儿！”

我傻愣愣站着半天没说话。

“难道我还不配做你的父亲？！你得喊我一声爸爸！”

我这才回过神来说：“好的，不过要等你到我们太仓来做客，我才能喊你！”而就在我转身辞别的那一刻，他居然从那张藤椅中站起身，坦然地张开双臂等待我的拥抱，忽然有一千种一万种惜别之情涌上我的心头，我不由自主贴近他宽厚的胸前，他几乎用尽全力将我深深一抱。

我猛然听到了他的心跳。

我的心脏也剧烈地跳动起来，甚至有点无法呼吸，这是我长大成人后的第一个真实的拥抱，一个惊心动魄的拥抱，一个男人的拥抱！

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离开宿州路9号文联大院的，这个曾经让我万分仰慕的圣地，如同当年的革命青年仰慕的革命圣地延安……

我满脑子都是他那些积满岁月风尘，占满了沙发的书报，顺墙根码着的文稿，还有他欲言又止微微颤抖的嘴唇。

就在文联附近的一个电话亭里，我拨通了他的电话，如释重负地喊了一声“爸爸”。

1993年的8月，列车载着我离开合肥时，我和很多毕业生一样是痛哭着走的。我没有同意白榕来车站送我，因为他动过白内障手术的右眼视力是0.5，左眼也只有0.2。

我开始在故乡一家中型国企当厂医。而每周都会和白榕通一次长途，收到他在两个放大镜叠加下写来的信。他的信封封都有编号，他喊我“云儿”、“我远方的小女儿”，我则称他“合肥爸爸”。

那一年他64岁，我22岁。

也许是我自小在父亲的巴掌底下长大的，父亲的严厉和暴躁让我一直没有安全感，觉得生命里少了什么。几年前在纸上失败的初恋，又让我的内心急需一种情感来温暖，白榕的关爱对长得瘦小又不漂亮的我来说，既是一种情感补偿，又鼓动起我对文学殿堂的梦想和希冀，让生性拘谨压抑的我，情感得以释放。我们之间的相互倾诉开始了，至今我还觉得，我们之间的爱更多的是文字之爱，是我们内心对理想之爱的一种渴求。

1993年的冬天，白榕去上海复旦大学拜会贾植芳教授，转道来看我，这是他第一次来太仓。他穿了件土黄色的羽绒服，在太仓街头等候。我忘了有没有喊他爸爸，只兴高采烈地叫了辆三轮车，带他到我们东门街的住地，用他的话说是一栋人字形的小木屋，小木屋里有善良的一家人，好客的母亲也拿出绝活，做了各

式各样的鱼虾款待这位远道而来的老作家。他在我们古城一呆就是一个星期，我还带着他去看了郑和七下西洋的起锚地浏河，在“锚泊瀛涯”的石雕前合影。我记得他当时说过的一句话：你们太仓该打郑和牌！

在浏河的老街上，顺手给他买了一顶乡下老翁戴的土里吧唧的绒线帽，配着他土黄的羽绒服有一种说不出的滑稽。他说当年他可有三顶大帽子啊，第一顶是叛徒丁玲的得意门生，第二顶是右派分子秦兆阳的爪牙，第三顶是特务陈登科的坐探。他的呢帽在上海火车站出站时，不知被哪个“三只手”看上，顺手摘走了。

我说，白老师早该“摘帽”了！

1994年的冬天，我穿了件湖绿色的呢大衣，那是我当时最漂亮的一件衣裳，搭着去麻城的车，坐在一个打工仔的皮箱上，晃悠了13个小时，凌晨两点车抵合肥。我是又冻又饿摸黑找到了宿州路9号，有一盏灯为我亮着，他为了等我开着灯守了一夜。我又回到了这个诗意的栖息地，我们坐在煤炉边喝着滚烫的茶聊到天亮。我想当时我们的潜意识里都有一种如遇知己的快慰，所以当他高兴时亲我的脸，我并没有觉得别扭，最让我感动的是他临时腾出儿子的一间卧房，告诉我怎么锁上房门休息。

从1993年8月至1995年7月两年间，我们的通信已达300多封，我们两地奔波也不下万里，我才知道他的风雨前半生，他曾经拥有过的黄金岁月。

白榕原名谭之仁，1929年出生于安徽芜湖，1947年考入前震旦大学医学院，随后考入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，毕业后入由丁玲创办的前中央文学研究所，1953年调《人民文学》编辑部任

编辑，曾编发过老舍先生的《西望长安》、王蒙的成名作《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》、李国文的《改造》、张弦的《甲方代表》、刘克的《1904年的枪声》等作品；1959年因“中间偏右”问题“发配”至青海省文联；1962年回到安徽，在省文工团任编导；1972年入安徽省文联为专业作家、一级编剧，曾因散文《唢呐曲》《红灯记》名噪一时。他有过一段痛苦的婚姻，育有两子，因双方性格不合，于1986年正式离婚。自1992年老母亲去世后，更少人关照他的生活。这份特别的师生父女情温暖照耀着我们。



与《人民文学》编辑部同事合影，后排左二为白榕，左三为苏中

情定青海湖

1995年7月，青海湖。

我从单位请了半个月的长假，我们相约结伴万里行，他是去寻访阔别了33年的高原和友人，我是想去寻找海子诗中的青海湖、得令哈和有马头琴响起的草原。我们在苏南古城碰头，从上

海出发坐火车直奔西宁，这是我们第一次大胆的远游，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，我们是以父女的身份去青海的。我带了很多方便面，背着大包小包去上海，火车票也是我在上海火车站，狂挤了两个小时才买到的硬卧。列车经过三天两夜的跋涉，终于将我们送到了那神秘的高原城市西宁。前来接站的是青海省文联副主席、作家陈士濂和诗人王歌行，他们都是白榕 33 年前的亲密战友，若不是陈士濂边举着迎接白榕的牌子，边大声喊着白榕的名字，即便相见也难相认。在飘着细雨的西宁火车站，白榕与老友们热烈地拥抱了。

当晚我们被临时安排在某宾馆住下，放下行李，我就开窗打量起这座濛濛细雨中的高原城市，隐隐绰绰的远山微微起伏在城市的边缘，就像恋人的胳膊将整个西宁市温柔地揽在怀中。尤其是从酷热的南方一下子来到海拔 2295 米的凉爽西宁真是说不出的快意，我像一只飞出笼的小鸟，巴不得明天就去造访青海湖、塔尔寺、昆仑山，就想在广袤的草原打个滚，骑一回马，住一宿帐篷。

“你当年发配到这儿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？这里天高皇帝远，难道没有一种远离高压政治的解放感？！”我问疲乏地坐在台灯下抽烟的白榕。“解放？是流放！傻丫头，简直是懵了！你想想看，是因为中间偏右的问题，从中国的心脏一下子发配到荒凉的大西北，死罪已免活罪难逃啊！‘青海长云暗雪山’，自古以来这儿就是流放犯人的苦寒之地，我来时西宁哪是这样繁华呀，冷冷清清的几条街，马路也不成其为马路，吃的是黑黝黝的青稞馍，抽的是生烟叶、冬青树叶，海拔两三千米，上个楼梯都要喘半天！就说士濂吧，他是浙江人，是提着把二胡闯西北的。歌行是本土作家，他的《土族风情画》写得多漂亮，他饿极了就吃不知从哪儿弄来的藿香正气丸……”我看到他的眼角有泪光闪动，便依偎着

他坐下，听他讲述那些高原朋友们各自的命运。

尽管和白榕亲密相处已有两年，但第一次和他同住一个房间还是让我非常别扭，觉得有种被占了便宜的感觉，磨蹭半天等他洗完澡睡下，才哧溜一下钻进凉被，不敢翻身更无法入睡，迷迷糊糊地被一个奇怪的梦惊醒，我梦见一个沉重的身体像莽苍苍的高原样地朝我身上压来，不由分说地亲吻我，我刚要惊呼，却发现那庞然大物竟是白榕！我惊出一身汗醒了，听到白榕微微的鼾声，天还没亮，我长舒了一口气。日后的这个梦告诉白榕，他还气鼓鼓地说：“瞧，你压根就不信任我！”好不容易挨过了一夜，一早我就跑到大街上买早点。我是急着要去看青海湖，但是他忙着会朋友，我只好成为他的小尾巴。

8月的西宁居然时不时地洒点细雨，我们出门也不打伞，手挽着手肩并着肩过马路，他还雄赳赳气昂昂地高唱着一支广告歌：“我们是害虫！我们是害虫！”逗得我咯咯直乐。苦恼的是常要满大街寻找物美价廉的吃食，白榕不吃肉，可我见着戴小白帽的回民当街烤牛羊肉就走不动路，见着挑货郎担卖高原饰品的就追着担子去了，他一晃就找不见我了。他也不恼，说：“我看你就把整个西宁买回去得了！”

由于第一次住的那家宾馆要收80块钱一晚上，我们由青海省作协副主席朱奇帮忙入住西宁宾馆的一间地下室，费用减半。也是由朱奇先生安排，我们花了一天时间游览了藏传佛教圣地——塔尔寺，在塔尔寺我第一次穿上漂亮的藏袍，请一位喇嘛给我和白榕照了张合影。奇怪的是这张照片上的我异常的漂亮，真的像一朵格桑花。

1995年8月4日，它是我和白榕在感情上发生微妙变化的分水岭。

大金瓦寺、小金瓦殿鎏金的塔顶在阳光下闪着金光。

从塔尔寺归来，我抑制不住兴奋，因为再过两天我们就要随中央音乐学院的一批教授去青海湖了！在西宁已有一个星期，而我们几乎没什么高原反应，除了访友外就是给他念此行未能谋面的他的朋友青海诗人昌耀、白渔的诗，“大草原白天牧羊，夜晚牧月亮……”

我们都陶醉在这纯净的气息里，似乎一切的苦难都不曾有过，一切的名利都可以放下，人都回归到了最原始最淳朴的状态。

就在赴青海湖的前夜，8月的高原显得格外宁静安详，宾馆的花圃里盛开着洁白的夹竹桃、矮株丁香、大福气花和金盏菊，我穿了条粉蓝色的真丝短裙牵着白榕的手散步归来。“冰云呀，我怎么觉着这地下室像巴黎圣母院，我是卡西莫多，你是爱斯米拉达！水，水，我渴，我要喝水！”他撅着嘴说起了台词。我依靠在床头，和他只隔着一个小床头柜的距离，我伸出了右手，手心里是两颗开心果。他没接开心果，只握着我的手没放，一只手却捂住了眼睛。我赶紧取出眼药来熟练地给他点上。“我福至心灵的小云朵，我粉蓝粉蓝的小花，我真想一辈子在这里住下去，不要离开我，不要不管我，只有和你在一起我才安宁！”我轻轻拍了拍他的脸颊，帮他脱去鞋袜，给他盖上被子。“别胡思乱想，听蟋蟀在唱歌呢！我不就在你身边吗？听话，好好睡！”不久他就打起了轻微的鼾声……

1995年8月7日，我终于奔向了梦中的草原。我们乘坐的白色面包车飞驰在青藏线公路，那实在是一条天路，你明确地感受



1995年8月在塔尔寺合影